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DOI:10. 15986/j. 1008 - 7192. 2024. 04. 004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理论回应与实践路径

——来自深圳的经验启示

陈玉梅¹, 李俊高^{1,2}

(1.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95;

2.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四川 成都 610095)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基于中国国情探索的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想禁锢,在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诸多方面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扬弃”。其中,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在保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充分结合,注入新鲜动能拉动生产力发展以助力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均衡促进生产效率与社会公平行稳致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促进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有机统一。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经济特区,依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铸就了“深圳经验”,对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7192(2024)04 - 0022 - 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就,在于我国的制度优势,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经济体制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巨大动能;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证实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

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道路的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几个方面。

国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从道路特色、道路前景、道路性质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色研究方面。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里奥斯指出:“在不丧失自身特点的情况下,中国制定了适应、复制和模仿他认为好的东西的计划,而不是盲目追随。”^[2]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一般性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扬弃,而不是盲目地复写、描摹,坚持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其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景研究方面。W·约翰·霍夫曼^[3]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改革以来,有关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已有好多个版本,但却没有一个单独的或相关的问题导致中国崩溃。他高度肯定了在面临各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乱、转为危机的能力,在如今对于批驳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

收稿日期:2023-11-21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研究”(CR2202);2023 年成都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样态及推动路径研究”(ZDJS202312);四川省 2023 年博士后科研项目特别资助“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典型样态及实现路径”(TB2023085)

作者简介:陈玉梅(1997-),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俊高(1986-),男,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关系、“三农”问题。E-mail:15283039205@163.com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同样适用。最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性质研究方面。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4]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在使用市场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把市场经济也看作是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市场经济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但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因此其同样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的研究形成了“历史演进说”“目标价值说”。仰义方等^[5]的“历史演进说”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进行划分,经历了从“被动响应型”转向“主动谋强型”、从“模仿学习型”转向“自主探索型”、从“单一的工业化发展”转向“多维度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带领下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正确的独属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汪亭友^[6]的“目标价值说”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式现代化进行对比,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独特性,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赋予了现代化全新的、独特的“中国式”内涵。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说”与“世界意义说”。刘守英^[7]形成的“中国特色说”指出,现代化作为当前一种世界级追求的现象,实现的模式和道路并不唯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制度改革和结构转型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坚持独立自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任保平等^[8]的“世界意义说”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并联式”的发展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发展模式实现弯道超车,以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等特点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吸引了众多民族和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路径。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通过发展动力引领、选择独特路径推进、找出难点重点突破等方面进行。一是于安龙^[9]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由单一动力推进的,而是由包括制度依托、政党领导、理论指引、目标导向、改革驱动、精神支撑、文化内蕴、情怀感召等在内的

众多动力的共同作用,以合力的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二是唐亚林等^[10]指出中国在经历了“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坚持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走自己的路”,走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组织等“齐头并进式”均衡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三是张占斌、王学凯^[11]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创新能力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建设任重道远、外部环境冲击、收入分配差距大等层出不穷,针对此类难题和痛点,提出坚持以“创新”推动科技战略支撑、以“协调”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以“绿色”扎实碳达峰碳中和、以“开放”构造新发展格局、以“共享”推动共同富裕进程。

综上所述,近年学术界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就目前来看,主要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基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事实作出理论回应,进一步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进行阐述,并结合“深圳”这一典型案例,逐步深入剖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是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二、理论回应: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

新中国肇始,至今70余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临特殊历史背景及其阶段性战略,实现跨越两个世纪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变革,本文将嵌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整体结构诠释经济制度适应性调整和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到:“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12]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动现代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支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一切历史冲

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567-568}。该思想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图1)。第一,生产关系变成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社会革命的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方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也是社会形态演进和发展的根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活跃的、能动的因素,而作为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然从原来使生产力得以现实化的条件逐渐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为了不丧失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就必然要去打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用新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第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原有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整体变革的要害,生产力发展引起原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构成对以原来生产关系为基础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的冲击,从而引起抗拒。要使生产力从原来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必然需要变革以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为生产关系变革开辟新道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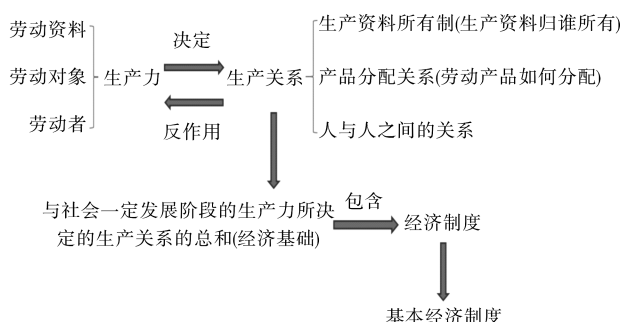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关系

马克思经典著作并未对经济制度有直接的理论阐释,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描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2}。明确了

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此外列宁还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15]311}明确赞同马克思将经济制度作为了经济基础的同义词的看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通过分析什么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物质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

理论界将经济基础的一般概念定义为: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且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也不包括当时所有的生产关系,更不是单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或其他某个单一的成分,而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学界将其理解为一定社会中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16]。一定经济基础只是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中包含许多生产关系,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旧生产关系的残存和新生产关系的显露,这些都属于社会经济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全部经济结构。最后,马克思曾将社会经济制度归纳为上层建筑的部分。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规定的要求人们共同服从的准则,具有强制性、约束性等特点,它是通过人的意识去反映客观存在而建立起来的精神性的东西,因此将制度归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制度是依照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进而来变革或保护现存的某种社会经济关系,是统治阶级意识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因而社会经济制度总是以一些法令、规章等形式体现。

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都是属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关系,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统治阶级依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所制定的,属于社会中上层建筑的部分。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并非统治阶级的主观产物,而是根据当时所处历史背景下的一定经济关系即经济结构的反映,即根据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对自身利益的反映所制定的。当社会经济制度制定出来后,也会对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发挥反作用,表现

为有力地保护或变革现存的经济基础,用以保障或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统领。社会经济制度包含了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居基础性地位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由其决定的分配制度等基本内容的原则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渐变性。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所有制反映了在生产过程中人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及相互关系,又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经济体制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具体形式。在拉美现代化的进程中采取的是暴力殖民掠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极不公平的分配形式,社会中极少数人占有国家财富的极大部分,造成两极分化严重、过度城市化突出、政治民主化锐减等问题。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打破拉美现代化的固定模式,走出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赶超了他们几百年的发展成果,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核心内涵。根据国情不断调整及变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打造全新现代化路径,明确中国现代化途径是“靠和平、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强调中国现代化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英雄,坚持中国现代化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逐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相互协调、齐头并进的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最活跃的总是变化在前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就直接引起了社会经济制度相应的改革和应变调整。随着生产力日益前进,表现出原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态,这种表现往往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显示出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突出的问题,必须要通过调整、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1949年至今,为了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依照基本国情,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我国经济制度主要经历了三次变革:第一次变革:1949—1956年,由于受到斯大林理论的影响,我国通过“一化三改”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复苏和

工业体系的建设,但是由于这种经济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使经济发展逐步失去活力。第二次变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通过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等形式,推动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三次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坚持深化改革,推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变革基本经济制度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总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两种不同所有制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以及由不同所有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控制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调整好在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结合,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制度支撑。

三、实践路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

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演进的实践路程来看,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习近平对此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将两个阶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思想基础、物质基础,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结合,逐步完善并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国民收入仅为360亿元,经济落后、工业基础尤其薄弱。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7]329}经过三年努力,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以重建和复苏。在面临“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双重任务之时,通过国家工业化来发展生产力,使我国

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实施,将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挥主导力量,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把个体农业、手工业、商贩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公私合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1956年底所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形成,新中国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在苏联援助下,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并逐步实现了1万多个工业项目的建立,集中力量获取了多方面的成就,包括“解放”牌汽车、喷气式飞机、机床厂建成投产等。在国防军事建设方面,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等,充分巩固了国家政权。在基础建设方面,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武汉长江大桥、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葛洲坝”等,由此获得“基建狂魔”的称号。在国际外交方面,1971年我国重返联合国大家庭,次年恢复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合法席位,充分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此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支配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经验,我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还是外交、国防等各方面,都获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

随着将社会主义从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理论上越来越显示出教条、主观地理解马克思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实践上脱离且忽视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渐形成了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为基础、并排斥市场调节的国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简单通过“大跃进”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其中“二公”是指要求土地、设备等生产资料实现由社会的共同占有,即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理论上来看是十分完美的,其优势能够集中人们的力量办大事,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目标导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步显示出该体制存在的弊端,避免不了生产过程中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难以调动生产主动性、积极性,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其“八年赶英超美”的口号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经实践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在单一公有制的带动下,出现生产效率较低,逐渐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匹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涨落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前二十年间,形成对于历史方位和实际国情判断的不准确、不清晰,影响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有效发挥。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取得的成果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各国需要结合自身具体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即若没有1949年建设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与探索,物质、思想、制度条件就无法积累,改革开放就难以顺利展开。在改革开放前建设期间形成了双重历史影响:一方面,该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客观国情,疏忽生产力发展而陷入“赤贫社会主义”的漩涡,妨碍并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该制度又为之后改革开放提供了发展动力和经验鉴戒,并为后期深化改革开放积累物质基础、制度基础。

2.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中国奇迹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化和发展其内涵,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图2)。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所属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又同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成为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活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良性互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方面的优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8],既保证了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确保我国的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为经济高速发展注入“新鲜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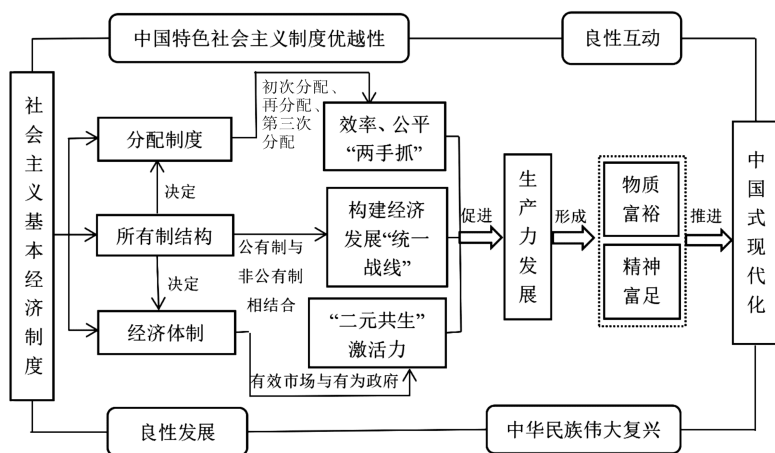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框架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组成要素中,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制成分在数量上有所浮动是正常的,但始终要求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总资产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始终不动摇,且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处的主体地位也毫不动摇。改革开放后,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其在国计民生中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促进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排头兵”功能,掌握着经济发展方向,在铁路交通、移动通信、载人航天等领域,还在突击性疫情救援、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交通先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交通”问题摆在了突出的位置。2022年,中国政府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四好农村路”为牵引,实现全国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4733亿元、修建农村危桥10589座、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7.8万人。积极助力城乡交流合作平台,使“出行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实现“因路脱贫”“因路致富”。为解决乡村明显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国务院提出“以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主体推进”的补偿机制,打通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大动脉”,截至2022年6月,我国已有67.7%的农村用户使用上互联网,实现村村通网,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加快农村现代化提供网络支撑,实现城乡融合“小循环”、国内国际“大循环”,助力现代化进程。

推动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统一战线”,充分利用非公有

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创造力、活力。非公有制企业在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技术创新发展、改善国民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可观的成就。国家利用国有企业在乡村振兴打好基本稳固盘的基础上,护航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发展,融合乡村丰富资源、城市偌大需求“两条路”。深圳充分发挥“两块牌子”优势,既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资源优势,又积极利用民营企业助力现代化建设。202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总产值突破4.55万亿元,荣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全国城市“两个第一”。社会各界私营企业通过收购乡村特色水果、特色蔬菜等农产品销往各地,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农产品“走出去”,打开销售市场。促进城乡融合既可以推动乡村资源优化、也可以使赋闲劳动力实现再就业,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统一。《2022深圳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上榜企业的总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15%,达10.16万亿,较2021年增长6.62%,同比增加20.11亿个就业岗位,累计贡献就业岗位436.9万个,研发投入持续攀升、专利数目再创新高(表1)。专家指出,深圳规模以上工业的稳步回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持续增长夯实了经济的“基本盘”,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0:44.8:55.2发展为2021年的0.1:37.0:62.9,预计到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将超过1.5万亿元,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我国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63.9%到2022年30.5%,农民的收入从“太仓一粟”到鼓起来的“钱袋子”,逐步由贫困迈入相对富裕的新阶段。

表1 2022年与2021年深圳企业500强对比

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速度(%)	企业数量(个)		占比(%)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0~15	130	155	26	31
15~25	79	53	15.8	10.6
25~50	115	76	23	15.2
50~100	63	34	12.6	6.8

注:数据来自深圳统计平台。

没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形成,就没有如今“富起来”的伟大成就。在走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公有制经济“打地基”、多种所有制经济“建高楼”的作用。

(2)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的优势。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以贯之高扬“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理念,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优先并兼顾公平,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尤其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完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切实保障劳动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将资本收入运用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实惠。

按劳分配为主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即指出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人口红利消失、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背景下,明确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才能进行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贡献存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情形,坚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以形成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后富的友好局面。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形成以资本、技术、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纳入分配方式考核的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社会生产活力,使一切社会财富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正在走一条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所具有的特殊内涵中,“共享发展”无疑是核心价值之一。

通过高质量发展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搭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彼此配合的制度部署。初次分配强调高效能,通过合理支配社会有限资源,激励经营者

通过合法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走上富裕之路,激发投资热情,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2022年比1978年名义增长了约138倍,达到了47411.9元。2001年3月,深圳政府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排头兵,为推进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分配制度,为规范分配体系推出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01年《指导意见》),2001年《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针对国有企业实行“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宏观调控”,对一般性、竞争性国有企业继续实行“两低于”原则;针对非国有企业工资完全自主分配,政府在尊重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的基础上,着重查处企业的欠薪行为。通过建立以劳动技能、责任、强度、贡献等为依据的基本工资制度,调整好员工的收入结构,将各方面的劳动收入纳入到工资总额。取消员工持股的限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在员工可持股的公司中,优先保证国有股有分配权的前提下,不再参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经营积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若没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起来,就没有后来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再分配更重视公平,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收入分配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社会消费的失衡,就会走向“两极分化”的错误道路,于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会保障缴费,以及转移性支出等方式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调节高收入者收入,使低收入者成为再分配的受益者。截至2022年末,我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为134570万人次,个人参保标准为320元,其中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政策要求,参保金额由个人只缴纳180元、政府资助140元,全国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如2017年5月,深圳政府为完善绩效考核体系、薪酬“能高能低”的收入分配机制,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属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健全能高能低薪酬分配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7年《指导意见》),2017年《指导意见》指出坚持业绩导向、市场化方向、分类分级管理、依法依规,

简政放权的原则,坚持奖罚分明、企业薪资能高能低,充分发挥市场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入挖掘企业内在发展动力,大力推进企业“人才强企”战略,落实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方式,构建重视脑力劳动价值的分配机制,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持续做大做优做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志愿行动、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等方式对所属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该分配方式完全出于自愿,既不属于政府分配、也不属于市场分配。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监测,截至2020年2月3日0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的慈善捐赠共计172.87亿元,捐赠组织包括企业143.01亿元、社会组织16.39亿元、个人2.27亿元。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而收入分配制度是达到该目标的重要路子。因此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均衡效率与公平,依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现代化。

(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优势。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与最优化,激发市场创新力与活力,发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优势,建设好服务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同时推动市场失灵得到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形成计划和市场的相互补充、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优势,贯彻共同富裕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具备制度属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市场经济能够推动竞争的多元化、多极化,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使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坚持“优胜劣汰”,淘汰低端劣质产品,推动产品和服务向高端和多样化延伸,有利于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即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主体,而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运行客体,主体具有自身价值目标、客体有属性和规律,主体的价值目标必须在遵循客

体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有效运行才能实现。根据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以供求关系形成合理的竞争引导市场价格的客观波动,形成市场价格反馈、引导机制,推动要素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以此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为政府具有完善制度配套、进行市场监管等优势功能,促进国民经济水平及质量攀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失灵”,以确保市场优势长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善与之适配的经济制度,充分发挥法治政府作用,激励各经济主体促进发展。由于资本逐利性特点决定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无法确保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导致恶性膨胀和企业大规模倒闭,因此政府就可以发挥克服市场缺陷的“有为性”,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稳定物价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成为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服务者。

作为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例子,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就始终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即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支持下发展,深圳之所以走在前面,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在了前面。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国务院颁布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试行“三来一补”,深圳(原宝安县)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签约成功,为深圳带来了“第一桶金”。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充分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服务业,推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型(表2、图3)。20世纪90年代,深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打造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政府坚持“以一域而利全局”,主动助力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在珠三角地区的带动下,推动东西两翼地区与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交通运输,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深圳作为核心城市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在克服经济、体制差异等方面做出实践努力,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打通了大湾区贸易、投资、信息、金融等多方交流合作平台,建立了“物联网+”孵化平台,以领先技术推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实现大湾区经济总量由2016年9.2万亿元到2022年突破13万亿元。

表2 1979-2021年深圳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 %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业	运输业
1979	100	37.0	20.5	42.5	11.8	8.7
1981	100	26.9	32.3	40.8	16.8	15.5
1983	100	17.2	42.6	40.2	17.1	25.5
1985	100	6.7	41.9	51.4	26.2	15.7
1987	100	8.3	39.4	52.3	29.4	10.0
1989	100	5.9	43.7	50.4	34.6	9.1
1991	100	3.4	47.6	49.0	39.3	8.3
1993	100	2.4	53.4	44.2	39.9	13.5
1995	100	1.5	50.1	48.4	40.0	10.1
1997	100	1.1	47.6	51.3	40.0	7.6
1999	100	0.8	49.9	49.3	43.2	6.7
2001	100	0.7	49.5	49.8	44.5	5.0
2003	100	0.4	50.7	48.9	46.6	4.1
2005	100	0.2	53.4	46.4	50.4	3.0
2007	100	0.1	50.2	49.7	47.6	2.6
2009	100	0.1	46.1	53.8	43.3	2.8
2011	100	0.1	46.3	53.6	43.3	3.0
2013	100	—	43.2	56.8	40.2	3.1
2015	100	—	41.2	58.8	38.5	2.7
2017	100	0.1	40.1	59.8	37.4	2.8
2019	100	0.1	38.5	61.4	35.3	3.3
2021	100	0.1	37.0	62.9	33.8	3.3

注:数据来源于《深圳统计年鉴(2022)》,图3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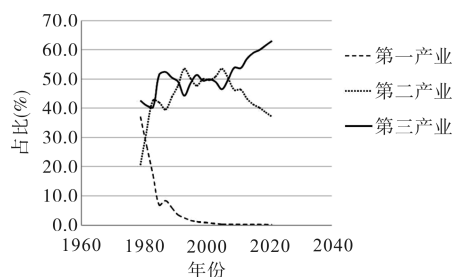


图3 1979-2021年深圳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协调推进,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始终为人民谋福利、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优势,也要发挥市场经济促进市场有序生产、有序竞争的优势,激发更高效的创造力、竞争力。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成功的典型案例,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守正创新的精彩样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性的发展与完善;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优越性,又表现出其与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匹配,经济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动力保障。深圳自上而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在社会各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群众深入参与文明实践,通过设立小区讲堂、工地讲堂等形式进行“文明蒲公英”基础宣

讲,打造理论讲解的“最后一公里”。深圳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对口帮扶9省、97县,培训全国乡村治理骨干和农业经营主体人,依托企业打造面向全国村官、村医、村教的“三村工程”,惠及帮扶地区人口90余万。然而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亟须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均衡社会资源配置、统筹规划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人才、资金、土地等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四、结论与启示

现代化作为世界级的一种现象,是不断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其中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维度,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产物,其将马克思主义建国原理与现代化道路相统一,从中摸索、探寻并走出一条完全契合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以及基本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它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追求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追求“单一公有制”到“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体制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形式,在恪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不变”与“变”原则,“不变”的制度根本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按劳分配等”,在“不变”的基础上引入“变”的制度因子“非公有制经济、按要素分配、市场经济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普照的光”,在循序渐进的演变进程中将“不变”与“变”有机结合,从死守“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收入分配“绝对平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方式;从封闭死板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合制度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韧性和价值属性,激发主体活力,推动基本经济制度效能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2] 胡里奥·里奥斯.“独创性”助中国取得经济成功[N].参考消息,2013-07-16(15).
- [3] 约翰·霍夫曼.中国走向未来:把握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N].参考消息,2008-09-19(10).
- [4] 约翰·罗默,梁爽,黄斐,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平等——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访谈[J].社会科学辑刊,2016,227(6):5-9,2.
- [5] 仰义方,武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鲜明特征与实践路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7(6):61-71,111.
- [6] 汪亭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及世界贡献[J].人民论坛,2022(17):40-45.
- [7] 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J].经济学动态,2021(7):12-21.
- [8] 任保平,张倩.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J].学术界,2022(6):33-42.
- [9] 于安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论析[J].上海经济研究,2022(5):67-76.
- [10] 唐亚林,周昊.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J].理论探讨,2022(5):29-38.
- [11] 张占斌,王学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优势、难点及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6):27-36.
- [12]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王孝哲.论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基础概念的区别和联系[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11-15.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8] 张琴.以“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J].红旗文稿,2019(23):27-29.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Found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Response and Practical Path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Shenzhen

CHEN Yu-mei¹, LI Jun-gao^{1,2}

(1.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95, China;

2. Joint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9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ed path suitabl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at the CPC leads the people to explore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breaks the thought confinement that "the modernization is equivalent to westernization", and "sublates"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ereinto, the socialist ownership structure is to fully integrate the public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ies and inject fresh momentum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remise to keep the basic direction of socialism unchanged. The socialist distribution system aims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progress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social equity by constructing the equilibrium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ird distributio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a promising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organic unity of resource possession mod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As one of the firs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rough long-te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nd successfully forged the "Shenzhen Experi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ownership; distribution system; economic system

【编辑 吴晓利】